

中国知识产权法在异质语境下的传播之路^{*}

——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知识产权精要》首版英文译者

薛凌访谈录

夏 慧 黄 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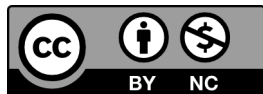
摘 要 | 薛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翻译硕士导师。湖北省口译协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方翻译理论批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等。近五年来，出版典籍外译研究专著2部，译著1部，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1项，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4项，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在中国典籍英译研究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基础，研究成果已获得学界的一定关注。2022年11月20日，在薛凌博士最新译著《知识产权精要》即将出版之际，笔者有幸对薛凌博士本人就翻译过程中的典型困难、法学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等问题进行了采访，访谈稿基于交流内容整理而成，以期对当代中国法学著述外译有所启发。

关键词 | 知识产权；法律翻译；传播路径；法学国际话语权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夏慧、黄琪（以下简称夏、黄）：薛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所主持翻译的我校资深教授吴汉东先生的著作《知识产权精要：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即将出版，在此表示祝贺！薛老师深耕典籍英译研究多年，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您此次的翻译研究项目却聚焦中国知识产权法，开启了全新的翻译视角。中国典籍和当代法律著述

的语言风格迥异，您如何适应这种转换，典籍英译的经历是否能在法律翻译实践中带来不一样的启发与思考？

薛凌（以下简称薛）：中国典籍，卷帙浩繁，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著作，能够一览古圣先贤在社会、历史、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哲思，这其

^{*} 本文受到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知识产权精要》（英文版，项目编号 19WFXA001）的资助。

中不乏跨越时代的智慧,让我们掌握历史洞见,从而培养一种历史观。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始于清末,其发展历程至今已逾世纪之久,时代在变迁,法律制度也在不断演进,自觉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当代中国知识产权学术成果联系起来,了解法律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演变方向和发展脉络,洞悉背后的历史原因,展现中国在知识产权立法上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历史观,恰是一名合格法律译者的审慎。我此前的翻译研究项目《〈春秋〉笔法与〈左传〉英译》,从中国经学诠释理念与史传精神的交汇点出发,探索在异质语言环境中还原中国话语丰盈诠释空间、开展文明间平等对话的路径与方法,尽管古代典籍和当今法学学术著作在语言表达形式和风格上差异巨大,但身为译者,我们的责任始终是面向世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时代的洪流也许会冲淡人们对典籍的记忆,但难以阻断中华民族流淌着创新基因的文化血脉。无论从事何种领域的翻译工作,译者都需要坚守本心,当代优秀学术成果历经时代变迁、历史演进也会在未来某一天变成后人的“典籍”,当前的任务,关键在于找到一条适合的对外传播路径,在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文化思维中找到最契合的“空地”,供世界人民交流,传播中华文化,展现中国真实客观的学术形象,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夏、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表华夏文明的经典著作更是浩如烟海。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亟须提升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判定一本著作的外译价值?您在选择著作外译上有什么心得和建议吗?

薛: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与当代中国学术话语“走出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所在,也是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实现大同世界精神理想的必由之路。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需上溯历史,回归中华文化的根魂命脉;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则需直指人类当下、着眼未来世界的格局与发展。因此在选择著作外译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从著作内容着手。内容要有针对性,避免同质化现象。无论是开展典籍翻译,还是推广当代学术成果,都需要选择一个具有针对性的研究视角,不能泛泛而谈。此外,也要考虑独创性,避免扎堆研究。一是要避免对一些已经有国际通行译本的著作再译,比如《道德经》

《大清律例》等。二是要尽量避免追逐热点。做研究不能随大流,不沉下来思考,很难做出成果。以我这次的翻译研究项目《知识产权精要: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s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ions*)为例,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背景之下,推介优秀法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世界繁荣与发展的重大命题。但是,我国当代法律文明与世界法律文明的交流与沟通早已不能满足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客观需求,优秀理论成果的译介活动亟须提上议事日程。因此,选择该著作进行外译,对传播我国知识产权界权威学术成果,促进我校优秀学术成果积极参与世界学术对话,具有积极意义。第二,从译者自身出发。中国优秀著作包罗万象,涉及的学科领域纷繁复杂,译者无法兼顾所有学科的翻译。因此,要结合自身擅长的翻译领域选择著作,合理利用平台优势,这更有益于创作出成功的译著。第三,考量著作的国际影响力。翻译既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翻译著作除了需要考虑作品本身,也要考虑市场反映。选择一部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著作进行翻译,意味着译本有广大的潜在读者,也更有利于后期在海外的推广。因此,对于帮助当代学术话语走向世界,译者要着眼国内国际的发展重点,从多方向多维度考虑,将研究方向与现实需要有机结合,挖掘符合当前发展潮流,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进行外译。

夏、黄:感谢薛老师的分享。法律著作翻译对于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意义,而法律专业术语翻译的正确与否关乎学术翻译的整体质量高低,能请您和我们分享几个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难点吗?

薛:法律翻译因其所具有的极强专业性,往往需要译者兼具翻译和法律专业知识的跨学科背景。我此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典籍英译,而法律文本与其他泛文学类作品的语言风格存在很大差异,语体正式,逻辑性强,句式结构紧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译本的整体行文风格,使其符合国际法律的表达规范,这对我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此,为了保证译本质量,我在开始翻译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阅读作者其他著作内容以及与作者本人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以期最大限度地

实现译者与作者间的“视域融合”。尽管如此,在正式翻译工作开始之后,依然面临很多实际困难。第一个是专业法律术语的翻译及其最终确定。因为书中有很多原创的理论和概念在西方法学语境之下是缺失的,需要译者不断查证、权衡。比如,吴汉东教授在书中指出,知识产权具有“一体两权”的特征,即兼具公共权利和私权的特征,是罗马法以来财产非物质化的产物。其中,“一体两权”和“非物质化”的提法是中国法律话语中的原创术语,在西方法律语境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包括中国法律中的常见术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权利主体”,我们的法律译者通常将其译为“person with limited capacity for performing civil juristic acts”和“subject of right”,但英美法条中并不存在这种表述。虽然《民法典》英译版的正式出版为我们的翻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术语标尺,但中西法律表述习惯的差异和对等性的缺失,使得法律文本翻译很难“照本宣科”“按图索骥”。第二个是法律英语的用词规范问题。比如“私权”如果翻译为“civil right”,就容易与美国“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产生意义耦合,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查证,以求最优解。又或是对于“著作权”的翻译,“authorship”和“copyright”两个词既紧密相关,也存在细微差别,在不同语境中作出正确判断至关重要。第三个是知识产权法本身的独特性。知识产权体现为法律法规,也是公共政策,与人权、私权以及公共权利等等重叠交错,它的形成有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的原因,也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抗争的结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我此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法律学习,对相关法律概念之间的历史渊源了解有限,所以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平行文献,以保证译本的最终质量。

夏、黄:中国的法律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从移植、引进到自立、创新的过程。中国在中外法律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也逐渐从“接收者”转变为“传播者”。您认为这种身份转变对于中国法学学术成果的外译工作有什么积极意义吗?您的最新译著《知识产权精要》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受到这种转变的影响呢?

薛:的确,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建构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翻译和移植西方法学的基础之上,中国与域外法学的交流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

断完善,中国在法治建设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世界法律文明的繁荣注入了新动力。投身法律翻译的译者,要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努力适应这种转变,助力中国法学话语主体提升主体性意识。首先,要树立理论自信。近年来,我国立法及整个法治建设成就斐然,译者一定要深入研究法治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想,作为翻译工作的切入点。其次,要扩大翻译领域。过去,我们可能专注于对某一部门法、法典的翻译工作;当下,我们可以拓宽视野,将翻译对象从政策性文件扩大到法律领域中的创新专著、典型案例、重大新闻等。将我国的法律发展脉络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知识产权精要》为我校资深教授吴汉东先生所著,该书立意高远,从中国视角审视和解读知识产权法及知识产权的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不仅代表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的最高水准,更从理论体系构建、制度发展以及运行实施三个层面生动还原和再现了我国如何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需要出发,进行制度创新和法律精神再造,并逐步实现知识产权法律本土化的全貌。在翻译过程中,因为这种身份的转变,我们作为译者也会将翻译重心放在传递作者原创的法律理论和概念上,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宣传中国法学学术成果,而非一味地迎合国际社会所偏向的法律话语。因此,将此著作进行外译既能够反映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水平与国际接轨程度,也能集中展现我国法制建设成果。

夏、黄:我们注意到虽然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且研究成果显著,但在国际上似乎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在您看来,该书的出版发行对提升中国法学学术国际话语权有哪些积极的意义?

薛:法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时代。然而,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法东渐”和中国晚清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变革的影响下,“中华法系”遭到资本主义和西方法系的双重入侵,逐步迈向衰亡。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球霸权地位,不断扩张其法学话语权在全球的势力范围。相比之下,尽管今天的中国在法学学术上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我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表现依然欠佳,提升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而“中国法学学术”走出国门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问

题，法学的国际话语权是由学术质量决定的，身为译者，我们的责任是全面而忠实地将中国优秀法学学术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助推“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转变，这对世界各国真实客观地了解中国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我翻译的《知识产权精要》为例，全书精选 25 篇在学界有较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内容涵盖对知识产权研究范式的思考、知识产权制度的文化、经济、政策科学与社会学分析、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与本土制度化道路解读，以及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认定与归责的洞见，集中体现了作者关于知识产权的主要学说思想。该书英文译本在海外的出版和推广可以展现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现况，一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饱受非议，并成为贸易摩擦中的核心争论焦点。在此背景下，本书的译介将对如实展现我国为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所付出的努力，介绍我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法治建设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起到积极作用，对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片面认识发挥“纠偏”功能，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和翻译价值。此外，以本书为代表的国内权威知识产权著作的外译，将形成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建构中的“中国力量”，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提供新动力，同时助力提升中国法学学术的国际地位。

夏、黄：最后，想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名典籍译者，此次主持法律著作的翻译，您最大的体会和感受是什么？

薛：我此前的研究重心一直是中国典籍英译，此次主持中国法律著述的翻译，对我而言是一项全新的挑战。我以前没有系统地接受过专业法律学习，在中国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研究也相当有限。因此，能接手这一外译项目，在感到幸运的同时，也深知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借此机会我也想感谢外国语学院“法学名家名作外译”项目的托举和吴汉东教授本人的全力支持。法律与翻译交叉学科纵深领域是我院长期以来的优势和特色，张洁老师、朱勇老师、周艳芳老师、肖鹏老师在法律翻译领域均造诣深厚，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对本研究项目的顺利开展意义重大。此外，通过翻译全书，我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不同历史时期下知识产权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获得了理解中国的新视角。更重要的是，在与吴汉东教授“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作者的精神力量。翻译项目在进行过程中，的确会遇到非常多的实际困难，每当疲惫的时候，我会翻开作者的自序，安静地读上许久，看到吴汉东教授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步履不停，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永远向前的追求”，我会感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也越发坚信，作为一名译者，展现中国法律工作者的精神追求和传递他们的学术理念意义重大，也希望更多的翻译工作者能够投身法律翻译，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法治建设成果，共同助力提升中国法学国际话语权。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of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Xue Ling

Xia Hui Huang 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Xue Ling, a typical scholar-translator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 China, has b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t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for many years. She has published two monograph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on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more than 10 papers in scholarly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areas such as translation theory criticism and approaches to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recent 5 years, she has branched into the field of lega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ed her first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s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ions*, which is written by Prof. Wu Handong, the leading figure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of China. In November 2022, I was privileged to make an interview with Dr. Xue Li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relea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s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ions*., discussing the challeng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made by Chinese legal scholars, with a view to enlighten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egal writings.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pproach; Discourse power in law